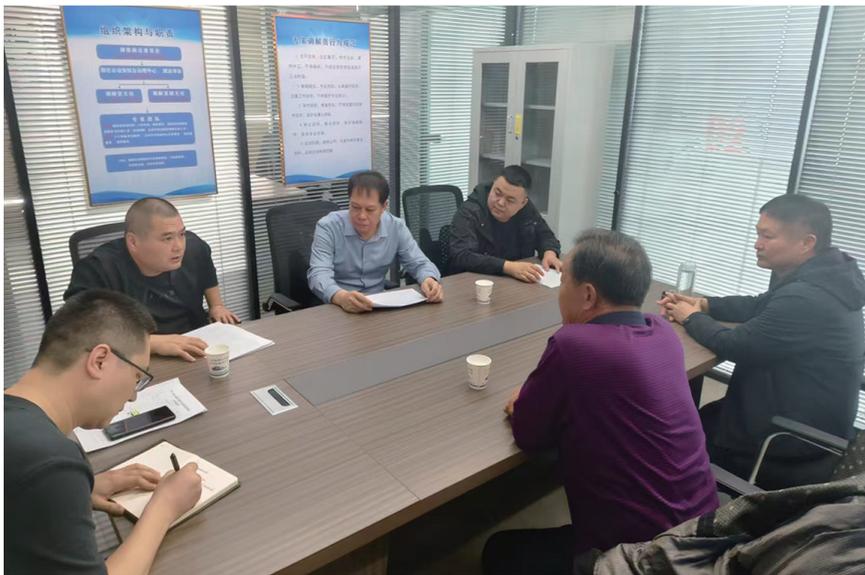




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,洒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综合治理中心的导办台上。几位村民正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引下填写表格,旁边的调解室里,平和的交谈声隐约传出。

2024年起,这座占地2700平方米的旗级综治中心,连同其下属的11个乡镇综治中心,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:墙上新张贴的“五办闭环工作机制”流程图,清晰记录着从“接办”到“督办”的全流程;创新成立的法学会专家调解委员会,在旗、乡两级综治中心设立了12个专家调解室,首批35名法律专家已入住开展工作;整合入驻的11个常驻部门,让群众真正实现了“进一扇门,解万般事”。如今,这张遍布全旗的治理网络,正见证着土左旗基层治理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运行”的深化蜕变。



调解现场

# 筑牢基层善治“桥头堡”

——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综治中心工作纪实

本报记者●郭惠心



赠送锦旗

3

## 基层治理的“最后一公里”

在察素齐镇综治中心,司法所、派出所、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在同一楼层集中办公,群众前来反映问题,再也不用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。

“过去老百姓有矛盾要解决,得跑4楼的司法所、1楼的综治中心,来回折腾特别不方便。”宋瑞平介绍,“现在我们把相关职能部门都整合到一处,群众进一扇门,所有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协调处理。”

这一变化,得益于土左旗大力推行的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。目前,全旗11个乡镇综治中心已全面完成组织重构、场所改造和制度升级,统一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综治中心主任,派出所、司法所所长担任副主任,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优化,让基层治理服务更高效、更贴心。

为保障乡镇综治中心规范高效运行,土左旗综治中心切实强化了对下指导力度,先后组织3期专题培训会,覆盖乡镇综治中心主任、副主任、调解员、网格员等四类关键岗位人员80余人,系统解读“五办”工作机制与平台操作流程,从根源上解决工作人员“不会做、难操作”的实际问题;梳理印制了《土左旗乡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指导手册》,明确建设标准、提供工作范本,并指导各乡镇开展了两轮自查评估与整改提升,确保各项建设要求落地见效。

扭转基层治理观念,不能只靠说教,关键要靠有效的工作机制和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。宋瑞平告诉记者:“将司法所、派出所等力量整合融入综治中心,让老百姓进来后确实能解决问题,久而久之,群众自然就会达成‘有困难找综治中心’的共识。”

2025年,各乡镇综治中心累计独立化解的矛盾纠纷已占全旗总量的40%,基层实战效能得到显著提升。以察素齐镇为例,当地整合司法所、自然资源所、“法律明白人”及农牧局等多方力量组成工作专班,全年成功化解土地纠纷85起,就地化解率达91.4%。据统计,土左旗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2034件,成功化解1842件,化解率达90.6%。

截至2026年2月底,全旗两级综治中心共受理矛盾纠纷817件,已化解586件,化解率达71.7%。这些数字的背后,是普通群众重展笑颜,是数起可能激化的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。“我们将继续深化‘五办’工作机制,推动治理模式从‘被动接诉’向‘主动治理’转型升级。”宋瑞平表示。

夜幕降临,综治中心的灯光依然明亮,如同基层治理路上的指示灯,既照亮着土左旗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行之路,也为更多地区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实践样本。

1

## 专业力量下沉的“土左方案”

在土左旗级综治中心的专家调解室内,一场因工厂裁员引发的劳资纠纷调解正进入关键阶段。来自土左旗法学会的专家调解员、劳动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和检察院派驻人员围坐一堂,面对争执不下的四川籍务工夫妻和企业负责人,从法律层面耐心分析,厘清责任。

“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,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,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。”具有律师资格的专家调解员正逐条向企业负责人解读法律条款。

经过两轮专业调解,企业负责人次日便主动作出让步,双方达成协议:企业按12000元的标准支付补偿金。当事人彭先生告诉记者:“要是没有专家调解室帮忙,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们不仅精通

法律,还特别有耐心,终于帮我们拿到了应得的补偿。”

这不是传统的行政调解,而是土左旗为强化基层法治能力首创的“法学会专家调解”新模式。

2025年11月,经司法部门备案,土左旗法学会专家调解委员会正式成立。委员会以分布在旗、乡两级综治中心的12个专家调解室为核心载体,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域的专业调解网络。

“我们通过‘综治中心+法学会’的模式,充分激活本土法律专业人才资源,为群众提供更权威、更专业的调解服务。”土左旗综治中心工作人员宋瑞平介绍。委员会从全旗100多位具有法律背景的专业人才中,经过严格审核筛选出首批35名专家调解员。这些专家来自公检法司系统、

行政执法部门和律师队伍,均有相关法律资质,或具备丰富的调解经验。

土左旗综治中心创新推出“赋能式调解”和“全程监管式调解”两种模式,针对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提供精准解决方案。其中,“赋能式调解”以责任部门为调解主体,由专家团队提供专业法律支撑;“全程监管式调解”则聚焦责任部门难以认定、易出现“踢皮球”问题的复杂案件。

“这就解决了行政部门不能与企业签订调解协议的问题。”宋瑞平解释道,“我们将政府职能融入专业调解,既保留了调解的专业性,又体现了权威性。群众拿到的不再是冷冰冰的行政决定书,而是双方自愿签署的调解协议书,对结果的接受度自然就高了。”

2

## 化解矛盾纠纷的“系统工程”

“过去老百姓解决矛盾,常常‘跑断腿、磨破嘴’,还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。现在我们通过‘五办’机制,真正实现了‘进一扇门,解万般事’。”宋瑞平介绍道。所谓“五办”,是指由接办、交办、代办、商办、督办五个环节构成的闭环工作体系。如今,旗综治中心作为“大脑”,乡镇综治中心作为“躯干”,村级网格作为“触角”,三级联动、同频共振,共同构建起全新的基层治理格局。

2025年夏季,持续强降雨引发了一起两村之间的纠纷:城留村抽排的积水大量流入相邻可沁村渠道,可沁村村民担心渠

道溃堤,扣留了城留村的抽水泵;城留村村民不甘示弱,也扣留了可沁村用于加固堤坝的挖机。双方争执不下,矛盾一触即发。

“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后,我们立即启动‘商办’机制,组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包村干部组成专班下沉处置。”宋瑞平回忆道,“司法人员从法律层面厘清权责边界,行政干部聚焦两村共同的安全利益耐心疏导。”

最终,两村村民达成协议:各自归还扣留物品,并共同建立排水观察机制。一场一触即发的群体性冲突,在“商办”机制高效运行中成功化解。

而在可沁村内部,另一场因桥洞堵塞引发的泄洪矛盾,也通过“代办”机制得到了解决。村党支部书记兼网格员赵海兵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这一紧急险情后,第一时间在村级层面完成“接办”。随后,他主动履行“代办”职责,现场勘察地形,组织涉事双方开展“微商办”,最终提出“先加固路西出水口,再挖开桥洞”的两全方案。“方案经双方同意后,村委会全程监督施工,确保出水口加固达标后再泄洪。”赵海兵介绍,“最终,路东村民的房屋转危为安,路西村民的财产也未受损失,矛盾在村内得到了高效化解。”